

【区域经济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视角研究*

李曦辉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创中华民族大家庭美好未来的精神力量之魂。目前,基于文化视角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已经很充分,但从经济维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成果尚为粗糙,影响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科学发展。发展的实践需要创新的理论提供指导,我们引入域观经济学理论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它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理,力图将经济学理论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机结合起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推动我国各民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维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3-0027-08 **收稿日期:**2021-02-09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我国既有的研究中,对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共同体认同理论研究比较透彻,而对经济因素影响认同的研究还显粗糙,尚未深入到应有的理论层面开展深入的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指导作用还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认同的实现程度。发展的实践需要创新的理论提供指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迫切需要强化各民族的民族国家及共同体认同,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特别是运用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各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实践,促成民族间和谐相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将运用创新的域观经济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试图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

体认同的经济维度,揭示出经济发展与共同体认同相互作用的规律,为有效应对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供理论指导。

一、研究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特别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②

关于文化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都做过深入研究,阿里·迈兹认为,文化是从共同体内部影响成员选择的重要力量:(1)文化提供了观念与认识的透镜,人们对世界持何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受一种或多种文化范式的影响;(2)它提供了人类行为的动机;(3)它提供了价值尺度;(4)它提供了认同基础;(5)它提供了交流方式;(6)它提供了划分阶层、阶级、等级与身份的基础;(7)它影响着生产与消费的方式^③。自古以来,中国的民族认同即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而不是血统的一致性,正是因为这种包容而非排他的特征,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集团。陈寅恪先生认为:“汉人胡人之分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④钱穆先生也认为,夷狄与华夏的区别在于文化而非血统,“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⑤。美国学者列文森也认为:王朝时代的中国,“国是一个权力体”“天下是一个价值体”^⑥。早在晚晴时期的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认为,中华民族的族名“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种名”^⑦。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先生撰文认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多数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⑧李大钊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人们应团结在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文化融凝的民族国家。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一个家庭。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⑨。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也认为,“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⑩。在这里,历史学家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中华文化不是任何一个自然民族的文

化,而只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文化,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混合而成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关于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的阐述最为贴切:“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⑪这种基于文化一统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一统,即民族国家,在各族人民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做出5个并存的判断,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⑫。这5个并存说明我们的民族工作有成绩也存在不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⑬在此基础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推动民族工作,既要依靠物质力量,也要依靠精神力量;解决好民族问题,既要解决好物质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坦率地讲,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物质力量的运用强一些,精神力量的运用弱一些……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要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并不是靠这一条就够了。应该说,问题的成因主要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在继续用好发展这把钥匙的同时,必须把思想教育这把钥匙用得更好。”^⑭

随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过去完全依靠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工作进行反思,学术界开始对经济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回顾,认为经济发展有促进民族关系优化的作用,也存在市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消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既是推动全球化的因素,也是造成民族危机和促进民族认同的力量,还是瓦解后发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推手。”^⑮应当说,现代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

展,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它既引致民族危机也会促进民族认同,研究者只是陈述了现象,并没有厘清其中的机理。还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日益瓦解,出现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差距,少数民族的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断裂”,造成少数民族群众某种程度的“党和国家认同危机”^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民族利益分配以及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民族利益的差异有可能引发民族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民族或族群冲突的根源^⑦。正因如此,“我国民族问题治理的全新思维:将民族工作的重点从‘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转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上来,凸显了我国民族问题治理思路不再片面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更加注重‘意识反作用于物质’”^⑧。

上述学者的论述,主要强调了市场经济发展给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以前研究所忽视的,现今加以重点关注,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民族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都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基础,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积极和消极方面影响时,要更加注重理论层面的研究,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入健康的轨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促进作用。

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回顾中可以发现,中华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机理已经研究清晰,那就是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进行了一一对应的研究,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文化一体而非血统一体的民族,文化的作用至关重要。近年来,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解构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新的社会结构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开始出现分殊的情况。然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它是靠文化凝聚在一起的,但共同文化的形成,却是得益于交往交流交融,“三交”的前提就是经济的交流,没有经济的交流,是不可能产生“三交”的。笔者曾经对我国的民族国家模式进行概括,“我们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民族国家模式,也

就是说,我国不同族体之间先有经济往来,逐渐形成文化认同,最后才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⑨。经济发展在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一味地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诱致了民族关系的恶化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下行,而是应该提出新的理论,用以约束民族成员的行为,使之向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迈进。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我们要正视改革开放必然性这个现实,通过理论创新,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找到切实可行的指导理论,从经济维度指导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从我国文化认同、多元一体的国情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学部委员提出了域观经济学理论,希望能更贴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能够更准确地描绘人类的发展实践。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假设人是自私的,时刻都在追求着利益最大化,否则经济学说就不存在了。金碚认为:“在现实中,所有人都不是生活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描绘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实际域境之中,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映射下的某个局部世界里。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具体‘商域’之中,他们的各种感受和行为方式也都形成于特定商域,而不会有抽象人性所决定的抽象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在不同商域中,不同的思、言、行特征,以及思、言、行之间的关系特点,反映了各自价值文化特征。”“商域经济学假定商业活动受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方面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理性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抽象性,而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则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⑩

经济理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微观领域创造财富只有两种路径,一是分工,二是创新。分工实践自古有之,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行总结的,他认为:“有了分工,同数劳动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

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⑧分工效益的最大化,就是尽量多的人参与分工,从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鼓励人们在经济领域建立最广泛的联系,其极致状态就是全球都通行一种经济规则,全人类都参与这一规则,每个人分工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就能带来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在这一经济活动的背后,就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大化,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首先实现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终实现全人类不同民族的一体认同,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消亡,世界大同。

目前阶段,由于通行市场经济法则,经济活动中还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的认同,而分工理论又要求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就目前人类生存的软硬环境来看,人类只能强化民族共同体认同,这已经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一体化,还不具备世界大同的条件,因此,现阶段分工有利于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创新,看似是一个简单孤立的过程,实则是一个成长于一种文化之中的个体,由于接受创新文化的浸染,而对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人类进步的环节进行挑战,实现突破,为人类带来新的生产函数,推进人类福祉的改善。创新是对一种文化认同和对另一种文化扬弃的过程,在现阶段也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推进人类诸文化发展完善的事物,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

价值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金碚认为:“人性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价值文化环境而作为赤裸裸的‘理性人’(经济人)而存在。所以,经济现代化,尽管是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化的过程。”^⑨关于文化,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则认为,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的成果,可归纳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狭义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它带有民族性,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也是与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它是指一个民族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的成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人类开始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样才能达到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效应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每个民族的文化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方面都会受到应有的抑制,从而逐步实现人类文化资源市场导向配置效益的最优化。正是市场导向的全球民族文化优化配置,使得各民族间文化开始重新配置,由于交往交流交融的逐渐常态化,民族间文化从互谅到共存,再到认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类文化最终也会实现推陈出新与一体化。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各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都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庇护下逐渐走向一体化,并为迎接全球文化一体化做好必要的准备。由此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理论相伴随,人类的文化最终也会走向相互认同。而今,这一进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制度形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金碚认为:“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和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制度形态及其特质又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所以,不同商域中的人的经济行为,具有理性(客观规律)和非理性(习俗文化)的双重性。”^⑪由于市场经济偏好竞争,使利益主体走向多元;受收益和成本的趋使,市场主体又追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效益,逼迫利益主体——自然人走向联合,人们需要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经济活动。这种竞争中最有效的利益主体整合方式,就是不同来源的人们实现文化认同,进而实现文化的一体化、行为规范的同一化。金碚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域思想流动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曾经的强大正是这一文明特质尽情张扬的表现;一度的停滞甚至衰落,则是自我封闭,特别是阻塞思想流动,僵化固守的后果。”^⑫这种经由市场经济形成的不同血统来源民族文化的互谅与统一性,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同时要求生产要素的软环境不断实现同一性,使得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具有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制度支撑,进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的制度形态同一化的过程,在存在民族国家分野的今天,就会推进形成包容性更大的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国而言,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回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从民族维度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笔者提出了民族经济新范式。定义新范式下的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⑧。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要素具有递进关系,需要民族经济学研究者进行理论回应。

民族过程的政治效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民族过程,包括民族分离、民族融合、民族相容和民族认同等,我们来探寻这一过程的政治学价值。民族分解过程:或者表现为一个民族分解为几个单独的民族,而原先那个民族便不复存在;或者表现为从一个民族中分化出几个与之并立的单独民族。这其中包括民族迁徙和政治分割。民族结合是指若干单独存在的族类共同体由于相互接近而产生地域和经济联系上的同一性、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的过程。民族结合包括民族整合、民族聚合、民族同化、民族融和。按照荷兰学者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的理论阐释,人类普遍趋于建立民族国家。近代以来,中国也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塑造自己的主权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由于中国的民族形成具有基于文化而非血统的特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样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得到强化,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民族过程的文化效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民族过程是一个发展方向截然不同的过程,它可能走向民族结合,即几个民族经由文化互认成为同一个民族;也可能走向分解,即一个民族由于文化的相互疏离而分化成几个相互独立的民族。在这一民族基于认同而进行的相互重组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一直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族间文化相互认同,几个民族就能够组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民族文化相互冲突,原本一个完整的民族,就能因此分化成几个互相区隔的独立民族。究其本质原因,就是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在发挥本质的作用。在当今的民族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民族文化,恰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影响因素,民族过程的文化后果,用经济学视角进行审视,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影响因素。

三、经济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佐证

我们提出的经济因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已经为中华民族发展史所证实,下面我们将沿着历史范式的研究方法进行推演,证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形成,处处离不开经济活动的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联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⑨“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汉族始终作为主体民族,起着凝聚核心的作用。汉民族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其形成与汉王朝的强大与巩固分不开的”。“我国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有机联系,是任何力量也无法使其长久分开的。而且一旦出现人为造成的暂时中断,便会带来严重后果;即使有时出现暂时中断现象,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恢复,且不断发展,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⑩。就像梁启超先生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说的那样:“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存大同,逐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⑪这其中居于决定地位的影响因素,就是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经济上形成的紧密联系。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⑫这越发证明了经济活动对于民族间关系的重要作用,经济活动是强化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论断。《史书》记载,汉代匈奴人的生活是,“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复不去夏冬不离窟”,直至“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⑬。由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匈奴人向往汉朝,故有“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与长城下”^⑭。在同一时代,鲜卑“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⑮。这些都说明经济联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重要的物质基础。接下来的唐代也是如此,《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一段西域于阗国引进中原桑蚕技术的故事,“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赦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于阗王)乃卑词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

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词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籽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女王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射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④这说明,经济因素是促成古代和亲及其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前一直没有引起学者的重点关注,现在我们要重点关注,并研究其内在的机理。与宋同时代的地方政权辽国,同宋朝开展了“茶马互市”,据载:宋初“置互市于原、渭、顺德三郡,以市蕃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二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驾,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⑤。正因辽宋经济关系如此紧密,才有《辽史》中如下的记载,“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霍(散布)无穷,故君四方指(边疆各族)者,多二帝子孙,而服中土(居中原汉族)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黄帝)后。俨《志》晚出,盖从周《书》”^⑥。由于经济活动使然,契丹与汉族交往频繁,最终在情感上也是渐行渐近,认为自己就是汉人,只是早年大禹的后代分布塞外而已,在血统上是没有差别的。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对中华民族形成与认同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元人比较以往的生活状态后认为:“今四海为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⑦说明元朝实现了各民族间一统于一个政权之下,经济活动的能量得到了极大地释放,这间接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情形更是如此,乾隆皇帝曾说,满洲人“原不识书籍,自我朝统一以来,始学汉文”^⑧。在清朝,学习汉文,接纳汉俗,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这也是经由经济活动促进各民族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过程。

2019年4月,笔者带领课题组对山东省卧龙电气章丘海尔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卧龙电气公司”)进行了调研,山东卧龙电气公司自公司建立以来,一直有数百名维吾尔族员工就业其中。调研重点围绕新疆籍少数民族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本次调研在山东卧龙电气公司共面向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90份,有效问卷186份。

课题组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思想融入情况做了调研,在“中华民族”概念的调查中,认为“中华民族”是指56个民族的占90%,认为是指汉族的占7%,认为是指少数民族的占2%,认为不清楚的占1%。在调查是否会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时,98%的人表示会,1%的人表示不会,1%的人表示说不清。在调查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时,54%的人认为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43%的人认为有关系,2%的人认为没关系。在调查是否认为宗教是人们摆脱苦难的重要途径时,90%的人认为不是,7%的人认为是,3%的人认为说不清。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相较于在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外务工的劳动者,因为经济活动强化了他们与所在地其他民族劳动者的交往交流,正在向着交融的方向迈进,体现出与所在地其他民族劳动者越来越接近的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认同倾向,说明经济活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四、经济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从经济维度出发,强化各民族的民族国家及共同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考虑以下路径。

1. 坚持经济理性,做大共同市场

经济理性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没有人们对经济理性的追求,就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人们可能也就无法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财富的丰富,人类社会的福祉就会打折扣。经济理性就是抽象掉人类其他方面的诉求,将人们对价值的追求放大到最大化的程度,而假设人们只追求物质利益。正是这种追求,需要人类社会将分工推崇的极致的程度,才能获得最大化的收益,然而,分工要求市场规模的极大化,市场的边界就会被推到过去不可能想象的地方,如果从民族维度分析,那就是人类要拥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这在现阶段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市场,下一步向所有民族共同的市场推进。这样看待经济理性与共同市场的形成,它有利

于形成民族共同体认同,对于现阶段中国而言,就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竞争促进文化的同一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人们需要生产生活要素,只要人们需要通过市场获取这些要素,由于存在稀缺性,人们就要通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来获得这些要素,人们之间出现全方位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产品的价格与成本,为此,人们努力减少成本,降低价格,这种努力延伸到微观领域,就是需要管理协调的成本最低。这其中文化的同一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的一致性,导致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有了统一的步调,不需要管理人员的协调,从而降低了管理成本,为产品价格的下调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这就为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世界市场越来越集中,提供了文化维度的解释。这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具有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3. 从经济理性到文化同一再到制度融合

经济理性是人类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发端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对人性的一种假设,自产生以来,就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人类在工业社会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人类得以在工业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理论力量。经济理性需要分工,分工需要最大化的规模与范围,这些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要趋同,也就需要人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制度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制度决定于民族集团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制度。所以说,在人类从经济理性到文化同一的进程中,客观要求民族集团融合成的民族共同体,不断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制度的融合,以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压力。这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4. 民族国家的生存需要经济一体化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是人类政治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可以说,民族国家是人类利益分置的基本单元。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就是将民族与国家紧紧绑定在一起,使民族以国家的形式出现,让国家具有民族的内核。之所以会出现民族国家而不是公民国家的形式,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祖国认同需要高

尚的道德情操做基础,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不断得到的修炼;人们的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文化的产物,人们倾向于与具有共同文化的民族成团共同组成国家,这就是民族国家,可以说组成民族国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相对容易组成的民族国家,在文化上具有排他性,而市场经济发展又需要统一的市场,在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中,要求人们逐渐认同规模范围更大的民族共同体和与之相伴的共同市场,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消亡、世界大同,形成全球一体的共同市场。在现阶段,民族国家生存及对共同市场的需求,都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从市场竞争到文化一体再到文化认同

西方国家大学经济学专业上的第一次课,老师一般会告诉学生,你无论多么富裕,你所拥有的钱都无法满足你所有的欲望,经济学就是如何最有效地把有限的金钱配置到你核心的欲望之上的科学。到目前为止,人类只发明了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即市场和计划。计划看似公平,但是缺乏实现的手段;市场貌似浪费,但能通过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逐步达到均衡。采用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就要时刻面对竞争,最后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一过程中,要求人们的行为方式逐渐同一化,这样可以节约协调管理成本,增强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占优。而这种行为的同一化,前提就是文化的一体化,再发展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形成稳固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6. 经济活动引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

历史的事实证明,经济活动是引致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原因,在交流困难的古代,如果不是经济活动利益的驱动,人们恐怕是没有动力走到一起的。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在欧亚大陆上开始实现了民族间经济方面的交流,比如,我们喜欢的面条、西红柿、胡椒等都来自这个大陆的西方,丝绸、瓷器等中国传统的产品,则从东方远走西方。这种经济的交流,带来了不同民族之间人员的交往交流,经过千百年来的接触,有的民族消亡了,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大家认同同一种文化,逐渐拥有了同一的

行为方式,也有的融合成了同一个民族。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引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③参见(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第200页。⑤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59页。⑥参见(美)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媒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⑧《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4-495页。⑨《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⑩《顾颉刚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94-106页。⑪《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58页。⑬《习近平看望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04/C70731-24527922.html。⑭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49

页。⑮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⑯参见李克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⑰参见杨鹏飞、田振江:《国家认同、法治与爱国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实现路径》,《宁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⑱杨鹏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⑲李曦辉:《论民族国家差异化的根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⑳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㉑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页。㉒金碚:《中国经济发展中理性观念演变历程》,《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㉓马艳玲:《胡适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页。㉔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的中国学派》,《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㉕金碚:《思想流动、域观常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㉖李曦辉:《民族经济学学科新范式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9期。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2页。㉘课题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131页。㉙《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㉛《盐铁论》。㉜《汉书·匈奴传》。㉝《后汉书·应劭传》。㉞《大唐西域记》卷一二。㉟《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㊱《辽史·世表》序。㊲《麟原文集》前集卷六《义冢记》。㊳《清高祖实录》卷四四三,乾隆十八年癸酉。

Study on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Shap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Li Xihui

Abstract: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spiritual power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create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present,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but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economic dimension are still rough, which affects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munity ident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guidance of innovative theories. We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domain economics and national economics to study their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and try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economic theory with the identity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 promotes all ethnic groups in our country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conomic Dimension

(责任编辑:晓 力)